

前言ⁱ

对比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找到对比的基础。否则，对比就具有随意性。因此，本研究选取时间空间、生命度和有定性作为对比的基础。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从人类语言的共性角度看，“有定性”“格”“体标记”和“生命度”四种要素对一种语言的句法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Croft 2003: 143-144)。汉语没有“格”标记，“体标记”虽然很丰富，但并不像英语一样拥有语法性质。“有定性”和“生命度”在两种语言里都是重要的语义范畴，深刻地影响着各自的语法结构。这就构成了对比的基础。

2) 时间和空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维度，不同民族对它们的认识体现在语言表达中，反映出不同民族对时间空间概念化的方式，因而是非常有意义，且很有必要深入研究的领域。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从时空关系入手，将迎刃而解。

3) 对比研究一定要服务于一定的目的。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怎样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并培养人们的跨文化能力，是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本书第五部分中的第九章讨论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对等，该讨论既对翻译理论建设具有

ⁱ 本书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支持(名称：英汉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编号：18JHQ048)。

启发意义,同时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文化交融与互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十章作为结尾性章节,指出了未来对比研究理论建设应该避免英语中心主义带来的认识与文化盲区,展望了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的应用价值与广阔前景。

对比研究,按照惯常的做法,一般注重发现差异。本研究既试图寻找差异,也试图寻求共性。发现共性是为了更好地为普通语言学理论建设服务,寻找差异当然是为了理论创新,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服务。笔者希望两个目的能够有效兼顾。

本书早期在系列丛中定名为《英汉语义对比研究》,2018年以《英汉认知语义对比研究》获批教育部后期资助,写作的过程中就自然地更多地偏向于从认知的视角展开对比。感谢系列丛书总主编王文斌教授同意更改书名。

需要指出的是,本对比研究尽量避免以某种语言为参照框架,而是在尽可能客观描写的基础上得出看法与结论。本书由五部分组成,每部分两章,共十章。

第一部分论述认知语义对比研究方法论的创新本质。

第一章简要概述了国内外对比研究产生的动因、主要研究方法和基本特征,提出了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的两个基本目标:揭示认知共性或机制、服务理论语言学建设。本章概括了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的本质特征:既是理论语言学研究,也是一种研究路径。本章的重点是阐述认知语义对比研究是一种新的对比研究路径,以确立其方法论上的创新意义。

第二章在阐释认知语言学关于语义的新认识的基础上,论述了认知语义对比的四个基本原则,即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动态原则、平等原则、客观原则和自然原则;详解了认知语义对比的三个层次及其互动关系,即形式入手、语义为本、思维为标;介绍了认知语义对比的四种主要前沿方法,即语义元、语义地图、认知类型学研究方法和语料库方法,四种方法各有所长,相互补充。

第二部分提出新的时空观，尝试解决汉语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第三章以充分证据论证了英语时空分立、汉语时空同态的新理论假设。英语时空分立，主要有以下几种证据：1) 名词和动词迥然不同的“定位”(grounding)方式。名词定位以表达空间意义的限定词为主要手段，有显性、隐性和间接三种定位方式；动词由时态和情态实现定位，其中时态是必备条件。名词和动词不同的定位方式，有力地证明了徐通锵观点的正确性，即有定性研究在英语里应该也要涉及动词的研究。2) 谓语的强时间性。在英语里，动词不但报告事件的发生或状态的出现，而且表达小句间的时间关系。这就能解释英语里非动词性成分作谓语时为什么一定要加be动词或连系动词。be动词的关键作用是表达时间关系，而不仅仅是传统语法认为的“连系动词”。3) 特征句的泛时化。英语中的类指句、中动句、宾语隐形句要用一般现在时，以前的研究很少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句法要求，这实际是认知与语义匹配的结果。这类句子的事件意义，即时间意义减弱了，存在意义增强了，表达稳定或恒定的状态，这就是认知上从序列性扫描思维转向概括性扫描思维的结果。4) 非限定(谓语)动词的无时化。英语里动词的非谓语形式没有时间上的定位，因而丧失了充当谓语的能力，但获得了名词、形容词或副词的功能，遵守着能量守恒定律。

汉语时空同态，语言系统各层次都有丰富的证据：1) 文化渊源与哲学认识。“宇宙”在古代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2) 汉语造字。汉语造字虽然以线性结构原则为主，但部首偏旁的位置对字义影响很大。3) 名词和动词的定位可有可无。与英语不同，汉语名词和动词无须定位，直接入句，体现构成关系。4) 谓语动词时间性弱，常用隐性的方式表达，因而允许出现名词谓语句、无动词分句。5) 功能转换不需要形态变化。名词和动词功能转换无须形态变化便能体现出“名动包含”的特征。6) 零句是汉语的基本单位。零句既具指称性又具陈述性，零句充当主谓语或话题与述题。7) 量词作为汉语的类

型特征，其活用反映出汉语时空同态的特征。8) 重叠具有时空量化意义。9) 副名结构和形动结构反映出时空的交织与重叠。10) 复现虚词既可以表达空间又可以表达时间。这些汉语的根本特征都能够在时空同态的理论框架下得到合理、自洽的解释。

第四章运用时空同态的理论假设，统一解释了“前”“后”时间指向“对立”这个历史经典问题。此处的“对立”指两个层次的对立：一是汉语和英语里“前”“后”表达的时间指向的对立；二是在汉语内部，“前”“后”都既可表达过去，又可表达未来。第一个层次的对立可以通过汉英语言里时间观念化方式差异得到解释。第二个层次的对立，从表面上看，“前”“后”都既可以指过去，又可以指未来，似乎很矛盾。虽然国内外学者已运用各种理论来解释该问题，但总是难以实现理论上的统一和经济性，甚至相互矛盾。本章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前”作为词素的意义指过去，“前”指未来是其“空间”意义和组合词词汇化以后，在隐喻的作用下进行表达，它们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和运行机制；“后”可以作出类似的解释。以时空同态的观点来解释该问题，实现了理论上的自洽和经济性。

第三部分阐释生命度影响语言编码和功能扩展的内在机制及其制约条件。

第五章论述了生命度在人类认知发展中的作用，阐释了生命度影响语言编码方式的选择范围与作用方式。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从表达方式的选择，到语序的变化，再到语篇运用的动态性。虽然英汉语存在一些差异，但基本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虽然英汉语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语系的语言，但生命度对语言编码的影响几乎一致，在静态的语言编码中一般遵守着高生命度居前的认知原则。这说明，生命度在人类概念体系、思维体系和编码体系方面具有认知上的共性。

第六章以生命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对比了英汉语里“领属构式”功能扩展及其限制，提出了汉语中的隐现句是分裂式领属构式的观点，这对解释“王冕死了父亲”这类句式提供了新的、更简洁有效的解释方式。英

汉语从领属构式到分裂式领属构式，基本遵循一致的认知原则，即生命度和话题凸显相互作用。

第四部分论述有定性是认知范畴。

第七章汇聚了有定形式表达无定意义、无定形式表达有定意义的各类证据，证明了以往研究把“有定性”看作语法范畴或语义范畴具有片面性，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并在深入对比英汉语中存现句差异的基础上，证明了以往语法范畴提出的构式中的“有定效应”是一种误解，甚至误名，后又充分论证了“有定效应”的认知属性，从而进一步证明有定性的认知范畴属性。

第八章探讨了谓语动词的有定性问题。本章首先论述了将“完成性”作为确定谓语动词有定性的语义标准。以此为基础，从“动词要入句充当谓语，首先必须定位”的三要素出发，论证了时态在确定谓语动词有定性方面的必要作用。一般而言，一般现在时表无定，一般过去时表有定。与此关联的现在完成时虽然也表示过去发生的事件，但由于与现在有联系，所以表无定。汉语里，确定动词有定无定的影响因素要复杂得多。就“着”“了”“过”而言，它们三个都表无定，但“过”可以表有定。从认知的角度看，句子表达的是现实性还是非现实性，将会对句子的有定性产生很大影响，会消解有定无定的对立。在人类语言系统里，有定无定表现出较大的语系差异。

第五部分讨论认知语义对比与实践。

对比语言学、对比分析的最初动因是服务语言教学和翻译研究与实践。本部分也回到这个最初的动因上来。

第九章提出了翻译中的认知对等问题。基于语义、概念结构的二元性特征，本章论证了对等只能在型符(token)概念层次，该层次主要是针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层面；不对等发生在类符(type)概念层次，因为这个层次积淀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语篇、体裁之所以难以对等也是因为语篇和体裁本身就包含文化个性。对事件或命题而言，对等主要体现在事件图式

层次，这实际上是前概念层次。总之，形式、意义(功能)对等是部分的、微观层次的，也是难以同时实现的；而认知对等是概念层次的、抽象的、整体的、相对的。不对等是永存的，这体现在文化层次和认知主体层次。

第十章作为结束语，在高度概括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理论意义的基础上，一方面强调了认知语义对比研究要基于语言事实，避免由英语中心主义带来的理论框架和元概念的偏颇，从而避开对比研究在实践和操作上的盲区；另一方面强调了认知语义对比研究要在认知语言学的大背景下，扩大对比的视野，扩展到构式的对比，从而更好地为语言学理论建设服务。

英汉认知语义对比研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语言教学而言，它对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起到非同寻常的作用。对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建设而言，它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英汉认知语义对比研究为重新认识翻译理论中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信念“对等”和翻译共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探索路径。对于文化交融与互鉴而言，它能够帮助不同文化相互借鉴，增强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为实现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互鉴提供进一步的可能性。

刘正光
湖南大学
2019年10月